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

BIBLIOTHEQUE

FRANCE

Leçons sur L'Histoire Co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论治史 法兰西学院课程

Raymond Aron

[法] 雷蒙·阿隆 著 西尔维·梅祖尔 编注

冯学俊 吴泓缈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治史/(法)阿隆著;(法)梅祖尔编注;冯学俊,吴弘缈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8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法兰西学院课程
ISBN 7-108-01847-0

I. 论… II. ①阿… ②梅… ③冯… ④吴… III. 历史
哲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893 号

责任编辑 陈 晓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5

字 数 315 千字 图字 01-2000-0142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借精神与情感——犹如凭借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分五个系列编辑。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位又具普及性的书库,有助读

卷首语

这本书主要汇集了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两门课程的文本,一门是1972—1973学年的课程(《从德国的历史主义到历史分析哲学》),一门是1973—1974学年的课程(《历史世界的建构》),这两门课程构成了关于历史问题的阿隆反思的最终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反思产生于30年代,1938年出的两本论文^①就是见证,它一直伴随着雷蒙·阿隆走过了他的整个心智旅程。1961年出版的《历史意识的向度》^②中所收集的1946年到1960年的文章就说明了这一点。在1963—1964这个学年里,雷蒙·阿隆回到巴黎大学执教,开了一门名叫《历史与哲学》的课,探讨历史认识批判所提出的问题。

不过,从1965年开始,在这方面完成一次全新的理论建设的必要性开始显露出来。1965年,雷蒙·阿隆应邀去

① 《历史哲学引论》,Gallimard,1938。S. 梅祖尔评注本再版,Gallimard,1986;《历史批判哲学》,Vrin,1938。S. 梅祖尔评注本再版,Julliard,1987。

② *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Plon,1961,再版(附P·西蒙的参考书目),Plon-Agora,1985。

阿伯丁大学吉福德讲堂(Gifford lectures)讲课,1965年和1967年他在那里先后作了两个系列的讲座,它们被共同命名为《思想与行动中的历史意识》。在讲座中他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

“重新审查历史认识问题,对英美分析哲学的成果和方法与德国现象学者和新康德派的哲学思考方式进行对照;写出曾在《引论》最后一页里宣布要写的书,它将讨论历史中的行动”^①。

这个总的计划大概导致了三本书的问世,它们被看作吉福德演讲的三卷本。其中的一本,《历史与暴力辩证法》是在吉福德演讲的两个系列讲座之间所准备的一年的课,评介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该书1973年出版。在该书前言,R.阿隆宣布:

“关于历史分析哲学与历史认识现象学的对比将放在第二卷中;结束本系列的(或应该结束本系列的,如果我还有时间的话)将是一个关于历史行动或关于历史政治的理论。”

这两卷书始终没有写成。这一对历史的新反思,发端于阿伯丁讲座,接续它的便惟有在此发表的法兰西学院的两个课程。爱好橄榄球的R.阿隆在《回忆录》中曾提到自己的讲授,他把它说成是“试投”,目的是为了在以后的书

^① 《历史与暴力辩证法》, Gallimard, 1973, p. 7 sq. 根据阿伯丁大学提供的吉福德演讲的课程提纲,我们更正了阿隆1962年和1965年写在该文上的某些讲演的日期。在《历史哲学引论》的最后一页(再版, p. 437)的注中,他宣布要写另一本书,此书将“帮助人们理解”“人与哲学当前的关系”。

中再进行“校正”：这并不是他对自己要求不严，他的结论是1972—1973、1973—1974这两年的课程最终不值得他花功夫进行校正^①。在后边一章他回忆了1977年袭击他的血管栓塞，他补充说：

“在这个日子里，我还没有排除写出《历史与暴力辩证法》后边的两卷书和最后一本关于马克思本人的书的可能性^②。我以为我还拥有必要的时间和力气。1977年4月之后，我开始问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这个可恶的小血栓留给我多少力气。”^③

这一章的结尾有个提示，说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只有放弃写书的计划，放弃“圆满地扣上”从1938年开始的“历史思辨”领域的“圆环”，以便进行一个“不那么费脑力”的事业，这事业大概已经成功，1983年，《回忆录》出版。

我们在此当然不是要否定R.阿隆本人的判断，硬要说1972—1973和1973—1974这两年的“试投”万事俱备只欠“改进”。在这些反思和成书之间无疑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把这些文字作为R.阿隆教诲的明证，原样地提供给读者：阿隆的全集中也收进了这本书，如果他的全集没有给教师阿隆活生生的言语留出一个位置，这全集就有辱使

① 《回忆录》，Julliard, 1983, p. 660 sq.

② 这本书应该对应于1976—1977学年在法兰西学院所授的课，课名叫《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③ 《回忆录》，pp. 688—689。

命。在《工业社会十八讲》^①一书——它同样也出自于一门课程——的前言中,R.阿隆本人也表述了这类出版物的局限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研究的时刻,为学生而准备的工作工具,本课程提示了一个方法,勾勒了一些概念体系,提供了一些事实和观点。它保留着,而且不可能不保留着上课的痕迹,即兴发挥的痕迹。这些课并不是事先写好的:其风格是言语的风格,不可避免地带有错误,事后的修改有可能减低错误,但却不可能清除错误。”

这些看法对我们将要发表的从未面世的稿件同样合适。还应告诉大家书中的尝试令人兴奋:《引论》发表近四十年后,由狄尔泰(Dilthey)和德国传统所引发的的问题在当代盎格鲁-撒克逊认识论的新背景中已被转移,至少表面上如此,本书试图把这种转移整合进历史认识的总问题。时刻想着修订是开放思想的特征,对讨论开放,对修正开放,更进一步,书中还敢于一赌:按一种传统的要求翻译另一种传统所关心之事,让两种表面上看来完全对立的传统进行对话。

汇集在此的文本在建立过程中借用了两份文件:

——一份借助课堂上的录音重新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我们想尽量贴近讲课时所用的口语,这份文件成了我们工作的基础:书面文本强迫我们作了一些调整,但调整的

^① 《工业社会十八讲》,Gallimard, Idées, 1962, P. Tsq.

幅度极小,纯粹是修辞性的。

——我们另外还拥有 R. 阿隆手写的备课笔记。笔记中有时包括一些完整地展开了的段落,有时(更多的时候)仅仅是一些极为简练的提示。把书面上展开的段落与打字机打出的口语文本两相对照,有助于我们确认,有时是校正后者。尤其是有三节课的录音打字稿失落了,这些备课笔记勉强帮我们弥补了这一空缺:这三节课的文字当然只剩下一个粗坯,我们用斜体字印出。读读它们并把它们与其他课文进行比较,你们将会发现 R. 阿隆在讲课中即兴发挥的比例大得惊人。

各章的标题来自 R. 阿隆本人:它们都在备课笔记中。

在附件中发表的有:1) R. 阿隆写的 1965 年和 1967 年的吉福德演讲的课程提纲(曾用英语发表)的法语文本;2) R. 阿隆做的关于他的两门课程内容的简述,它们来自法兰西学院的年鉴。

我们放在本书最后的尾注仅限于对在授课过程中所列举的主要著作提供必要的提示。

我们特别要向苏珊·阿隆和多米尼克·斯纳佩对本书出版工作的友好协助表示谢意。同时我们还要感谢雷蒙·阿隆基金会热情有效的支持,感谢伊丽莎白·杜塔特在辨认手稿时所表现出来的可贵耐心。

西尔维·梅祖尔

目 录

- (1) 卷首语
- 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历史分析哲学(1972—1973)
- (3) 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历史分析哲学
- (22) 马克思主义与元科学
- (38) 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
- (59) 客观化的马克思主义
- (78) 从客观化的马克思主义到分析
- (95) 什么是历史?
- (113) 编年史与历史
- (132) 历史解释
- (149) 历史解释与知性
- (168) 知性与叙事
- (188) 故事与历史
- (192) 论因果分析

(211) 过渡

历史世界的建构(1973—1974)

(219) 论题

(239) 经济中的个人主义

(256) 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

(272) 波普与历史哲学

(290) 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与历史

(308) 责任,罪行,意愿

(326) 从叙述到科学

(343) 从叙述到科学(续)

(361) 历史与社会学

(379) 微观事件与整体

(396) 客观化的三种方式

(413) 实践集合与再生产

(430) 解释与叙述

附件

(439) 思想与行动中的历史意识——吉福德讲堂讲演提纲

(484) 课程内容提要——取自法兰西学院年鉴

(501) 编者注

从德国历史主义到 历史分析哲学

这个课程的名字叫做“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历史分析哲学”，第一课我想点明主题。最终我还是在另一个形容词面前退却了，即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分析哲学，因为历史分析哲学一直为英、美学界所垄断，该哲学的主要著作都用英文发表。

关于“德国历史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分析哲学”这两个术语所涵盖的内容，我现在就试着给大家作一点说明。

界定“历史主义”一词，我认为有两个难点。第一个不难排除：在一般用语或哲学用语中，“历史主义”或“历史性主义”这两个词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波普(Sir Karl Popper)用它们来表示一个非常特殊的含义，与它在其他哲学著作中的通常含义不一样。波普的一本小书(有法译本)便被命名为《历史性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¹，波普在该书中把历史性主义看作一种观察历史的方式，据这种方式，一种人必须屈从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决

定和操纵着历史。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其表现形式为历史规律,主导人类演变总体运动的规律。这其实不过是想认识未来,或者说,想要建立宏观历史演变的规律。

这并不是一个常见的对“历史主义”的阐释。我现在就来列举两本经典德语史学著作,以便说明该词还可以表达另一个意思。

这两本书一本是梅奈克(Meinecke)的《历史主义的诞生》(*Die Entstehung der Historismus*),另一本也是经典,即特勒尔奇(Troeltsch)的《历史主义与它的问题》(*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²梅奈克和特勒尔奇都认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是一种人类史学观,根据这一史学观,人类的演变取决于各社会、各时代的基本差异,所以也取决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所特有的多元化价值。用这种多元化价值观进行阐释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它与启蒙运动的价值观相反,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认为人类具有普遍价值,它与理性的胜利相连。

梅奈克和特勒尔奇所采用的是一种最常见的意思,但第二个难点就发端于此。如果说“历史主义”大致上可用来指人类本质上的多样性这样一种世界观,即人在思、感、欲和评判善恶的基本方式上的种种差异,它仅仅反映了问题的头一个方面,而且还是历史思维方式中相对肤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以在时间长河中实现的精神世界的多元化为起点,德国历史主义滑向了对历史进行形而上学的再现,历史被看成是创造性的演变:人类在时间中创造精神世

界,精神世界既是他的作品也是他的存在;人类既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这是故弄玄虚的说法,简单地讲,就是当我们每个人看自己所属之世界时,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外在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生活的社会左右并操纵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同一个精神的或社会的世界又以各种不同形式被纳入观察者的意识:我被 20 世纪法国社会所左右;通过我讲的语言,我用的概念,别人在对话中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个 20 世纪的法国社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显现在我的思想和意识中。

人类演变就是在时间中对不停变化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这种历史主义观与 19、20 世纪中两种有过重大影响的思想运动相连。这两种运动一个被人们称之为阐释学或阐释论,另一个则是存在主义类的哲学或对人类生存状况所进行的思考。

关于阐释学,它与贯穿整个 19 世纪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运动有关。如果要对阐释学的基本主题作个提示,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试图重建或复活的对过去对我们而言仅仅存在于过去的遗迹中,存在于先人的建筑以及他们试图用来表达其思想的作品中。对历史进行思考就是对历史进行“阐释”:阐释前人书写的语言或阐释他们留下的作品和建筑。所有历史认识都是人对人的认识,可以称其为一种辨认:对凝聚在文字中的言语的辨认,对已逝文明的遗物的辨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献学所做的也是一种阐释工作。

从这个侧面看,历史认识在本质上就是阐释别人的语言,不管其语言是石头语言还是文字语言:艺术史是对艺术作品的阐释,前人通过这些作品与我们交谈;哲学史是对哲学著作的阐释,逝者通过它们继续与我们对话。在这个意义上,阐释是一种对话意图。如果你们打开克洛德·勒佛尔(Claude Lefort)最近出版的关于马基雅维里的书,就会发现他在其中发展出一整套阐释学理论来对马基雅维里进行阐释,他试图与马基雅维里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一个是20世纪的人,考虑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另一个则生活在16世纪的意大利城邦中,思考着其城邦的事务。³

阐释学在这一点上与历史主义相通:说到底,我们只能通过阐释工作来认识或理解过去,认识或理解前后相继的种种精神世界。文献学是阐释学的一种表现或技术手段,因为全部历史就在于阐释。

由于历史认识倾向于与阐释工作相混淆,于是立即冒出一个附带问题:阐释者的问题。阐释者,史学家,他属于一个时代却研究另一个他不属于的时代,他在精神上带有其时代的客观烙印。例如勒佛尔就站在20世纪与马基雅维里对话。于是出现了下面这个问题:历史编纂或历史认识难道不算历史吗?经过这样一转弯,一个曾经主宰过历史思考的疑问被提了出来:对过去的阐释与史学家所属的当下是否连在一起?每个时期的史学家事实上是不是都在无休止地重写历史?每个社会是不是都在根据当代的意愿重构过去?通过这一转折,我们便从最初的历史多样性过

渡到历史主义,过渡到逻辑学问题,即关于历史认识之真实性的或普遍真理的认识论问题。

尽管这一分析十分简略,但还是可以让你们感受到包含在这些论题中的丰富性。特别是汇集在“德国历史主义”这一词组下的那些哲学论题,即具有创造力的演变,各时期和各文化的多样性,每个时期和每个文化所拥有的特性;由此可见,历史认识是一种解释性的或理解性的特别认识,它与应用在自然事物上的认识全然不同;另外还有这个认识的历史性,说到底可能还有存在本身的历史性——它把我们带向存在主义思潮。

“人类存在的历史性”的含义并没有超出我的提示:人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生活在变化中,说人类存在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本身都带有他所属时代的特征,他同时根据这个时代和他对过去的看法给自己下定义;因此,他的人类生存状况迫使他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一个特定文化的阐释者,讲一种语言,用某种方式看世界。

这一总的思想运动并不为德国所独有,但它首先在德国发展起来,30年代传到法国,并在二战之后的存在主义——历史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大致上讲,德国历史主义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些拉丁语国家被广泛接受。在法国,它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相汇合,变成了萨特的历史理性批评精神。至于盎格鲁-萨克逊世界,通过黑格尔的后继者或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主流外的一两个哲学家,该世界无疑也接触

到了这一历史主义运动。大致上讲,不久前,英国人或美国人主要是通过一个名叫柯罗齐(Croce)的意大利人和一个名叫科林伍德(Collinwood)的英国人间接地了解到历史主义的——科林伍德的《历史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便完全是在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下写成的。⁴

通过提示主题我们可以勾勒出历史主义的大致范围,但对我所说的“分析哲学”来说就此路不通了。事实上,我认为不可能根据哲学论题——例如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论题——来给英、美分析哲学下定义。我以为那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推理方式。就其本质而言,我想简单地说分析哲学主要是用来分析语言的:分析日常语言,比如说分析日常生活用语的牛津哲学;分析科学语言,它则要求逻辑严密,时刻注意判断命题有无意义,是真还是假。我想大概所有分析家都会接受这样一个定义:科学是一种语言,它描述现实中的某件事并作用于现实;哲学是对描述现实的语言的思考。这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分析作用于现实的语言,或分析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在以上两种情况中,我们接触到的都是第二个层次上的语言。或者,我们设想处在第一层次上的不是随便哪种普通语言,而是科学,我们就可以说分析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元科学”。元科学这个概念已经是个常见的概念,它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对科学语言或科学本身的一种分析或思考。在历史分析哲学著述中,我们可以列举两本在美国出版的书:一本是丹托(Danto)的《历史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

ry);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怀特(Morton White)的《历史认识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⁵ 这两本书都是对历史认识之特殊本质的思考,致力于确定作用于现实的史学家的语言到底为何物,与德国研究历史的方式完全不同。

这样一来,欧洲大陆哲学家想要与分析哲学家进行对话往往很难。为了说明我这个具有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人要和一位英国分析哲学家对话有多难,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我曾经去阿伯丁做关于历史主义意识问题的系列讲座,在一次讲座后的讨论会上,一位教授问了我这么一句话:“假若我向您说在座的施密斯先生于1983年元月5日去世。您会怎么说?”我犹豫了一下答道:“我会说您说了句蠢话。”讨论到此为止。其实是我讲了句蠢话,因为,对一个分析哲学家而言,弄清楚在1973年断言当时当地与我们面对面的施密斯先生于1983年元月5日早晨8点去世这句话为什么毫无意义,这并不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其实这命题在语法上无可指责,和一个普通命题一样:“施密斯先生于1983年元月5日早晨8点去世”和“阿道夫·希特勒于1945年5月5日或6日某时去世”这两个命题之间没有语法和逻辑上的差异。从语法上讲,两个命题是一回事,词序一样;然而,在1973年提出这一命题会让我们觉得它毫无意义。头一个荒谬之处是它把一件将来才会发生的事处理成过去时,于是就导致了以下这个有趣的悖论:这个在1973年根本无法证实的命题在我们今天有可能为真。